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陈旭峰 田志锋 钱民辉

[摘要]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打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很多组织对农民工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不容乐观。当然,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差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融入状况; 组织化

[作者简介] 陈旭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田志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共山东省兖州市委书记; 钱民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①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其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根据不同的生存状况,可以把农民工分成三种类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发展型”。“温饱型”是指那些只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农民工;“小康型”是指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农民工;“发展型”是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富足的农民工。人具有两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组织化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人如果脱离了

单位,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依靠,他的生活将得不到保障。随着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民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农民工组织化,是指城市农民工为了获取一定的社会支持,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主动加入社会各类组织的状况和程度。^[1]

组织对于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钱正武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国民待遇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与农村流动人口缺乏组织化以及相应的意见得不到合理表达有密切关系。组织是凭以立足于社会和求得发展的基本保证,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来说,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缺乏组织保护,农民

^{*} 本文是钱民辉教授为课题负责人的“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课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共山东省泗水县委办公室的共同合作项目。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钱民辉、田志锋、陈旭峰、陈灿宇、孙智群。通讯作者:钱民辉:mhjian@pku.edu.cn。

^① 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的定义有很多种,在我们的研究中,是从广义上来定义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凡是外出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民,我们都把他们归为是农民工,而不管他们是在城市、集镇还是农村务工。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我们也是根据这一定义来进行的。

工在就业选择、工资水平、与雇主签订合同、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2] 推动农民工组织建设, 不仅对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的完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且可以产生培训、就业和维权三位一体的聚合效应, 有效地强化农民工内在自我能力的保护与发展。^[3] 农民工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并且是工人阶级中人数最多且越来越多的部分。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相比, 他们是最弱勢的群体。因此, 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切实维护他们的权利, 无论是从政治上看, 还是从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上看,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出根据不同的生存状况可以把农民工分成三种类型, 而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农民工不同的社会融入状况来体现。社会融入状况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民工参加组织的情况, 我们认为社会融入状况越好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中去, 本文的研究也主要是对这一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二、研究述评

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学术界, 很多学者认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适应的过程。朱力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城市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5] 在提出三个层面适应的基础上, 朱力认为, 经济层面上的适应应考察农民工的职业、收入和住宿; 社会层面上的适应应考察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社交; 文化层面上的适应则要考察他们的观念、心理和意愿。^[6] 石刚等人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浅层适应阶段和深入适应阶段。浅层适应是指农民工可以按时按量得到城市生活需要的资金, 深入适应是指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已经融入城市生活。^[7] 学者们普遍认为, 当前农民工的适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层面的、浅层的适应。

有些学者从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成文等人认为, 社会学在组

织化问题研究上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 即冲突论视角、功能论视角和互动论视角。从冲突论视角来看, 组织化是一种有效的冲突化解机制, 它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目标和利益的整合与明晰, 有利于消解由沦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张力; 从功能论视角来看, 组织化是一种有效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 它具有持续性、可靠性和可控性等功能特征, 能够长期有效地支持农民工改变其现实生存境遇; 从互动论视角来看, 组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机制, 它有利于农民工个体角色的正式化、群体阶层意识的形成以及整个国家与社会互动、互惠关系的平衡。^[8] 王光甫以自组织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农民工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条件和动力机制, 认为农民工要成为自组织系统的条件还不成熟, 它只能部分地满足开放性条件, 系统尚处于近平衡状态, 还没有呈现大量的非线性状态。^[9]

有些学者从现实角度出发, 对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徐旭初等人以浙江省农民工维权为例, 从“法团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视角, 揭示了农民工维权组织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两大生存困境。^[10] 刘小年对农民工的组织状况做了相关研究, 他认为, 农民工尽管已有自己的正式组织——工会, 但非正式组织仍是主体。要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建设, 就必须认识非正式组织的特征、形成条件、功能及组织管理政策。^[11] 周明宝等人对青年农民工的组织化与劳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他们认为,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规模化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 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是我国劳资关系走势的基调, 它的实现有赖于通过农民工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 有赖于公共部门摒弃纯粹的发展主义, 在劳资关系上培育合作主义, 从而塑造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新型劳资关系。^[12]

此外, 还有学者对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卢国显通过相关性分析证实, 经济地位、社会距离、社会冲突、安全感对农民工加入非正式组织的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他认为应尽快建立农民工就业支持体系和涵盖城乡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创造良好的城市治安秩序, 提高社会安全感; 加快制度创新步伐, 积极引导

农民工加入城市正式组织，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和歧视，并提高农民工文明程度。^[13]

根据以上对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及组织化相关文献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1）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总体上说，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并不乐观，处于一种初级的融入阶段。（2）相对而言，关于农民工组织化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相关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农民工的组织化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3）关于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少涉及，零星涉及的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从抽象层面来研究，实证研究还很欠缺。而我们的研究是从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这一角度来考察对其组织化程度的影响，探讨在农民工融入打工地社会的过程中，哪些社会融入因素影响了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通过找出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社会融入因素，对症下药，提升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从而使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工，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

三、研究假设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研究假设是融入状况越好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课题组是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选择变量的，这是我们研究当中的自变量，而农民工参加组织的情况则是我们要研究的因变量。由这个研究假设可以衍生出以下三个更加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 1：经济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有正向的影响。经济层面的适应对农民工来说是最基本的，只有经济上适应了，农民工才有条件去考虑其他问题。农民工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对其参加组织存在排斥作用。我们认为农民工只有在经济层面上适应了才会积极参加一些组织。经济层面适应得越好，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我们用六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经济层面的适应情况，包括：（1）职业；（2）月收入；

（3）工资水平能否保障生活；（4）是否签订劳动合同；（5）是否有加班费；（6）是否缴纳保险。

假设 2：社会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有正向的影响。社会层面的适应是指农民工在经济层面适应的基础上加大社会交往的力度，积极融入打工地社会。我们认为社会层面适应越好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我们用六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在社会层面的适应情况，包括：（1）社会地位；（2）与打工地居民交往情况；（3）与外来打工人口交往情况；（4）是否受同等对待；（5）工作小时数；（6）正常休假情况。

假设 3：心理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有正向的影响。心理层面的适应是最高层次的适应，完成了心理层面的适应也就意味着农民工融入了打工地社会。如果说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适应情况是农民工融入打工地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心理层面的适应情况则是农民工融入打工地社会的内在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心理层面适应越好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我们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心理层面的适应情况，包括：（1）认同自己是哪里人；（2）打工地是否有家的感觉；（3）赞同打工地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程度。

四、样本情况描述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我们于 2009 年 1 月在山东省泗水县进行的“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该课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共山东省泗水县委合作完成的。此次调查覆盖泗水县的 6 个乡镇、73 个村庄。^①泗水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县，外出务工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重相当高，其研究结论在全国有较好的代表性。整个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 315 份，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研究，我们去掉了在相关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个案，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 922 份。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我们的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男性人数占总

① 这 73 个村庄的分布情况是：泉林镇 11 个，济河街道 12 个，星村镇 11 个，杨柳镇 13 个，圣水峪乡 12 个，大黄沟乡 14 个。

体的 83.4%；年龄以青壮年为主，45 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体的 14.1%；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有 643 人，占总体的 69.7%；大部分调查对象已经结婚，占总体的 72.2%；

外出打工 1~3 年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 414 人，占总体的 44.9%；农民工以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为主，占总体的 62.1%。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频数 (%)
性别	男: 769 人 (83.4%); 女: 153 人 (16.6%)
年龄	20 岁以下: 78 人 (8.5%); 21~25 岁: 204 人 (22.1%); 26~30 岁: 138 人 (15.0%); 31~35 岁: 108 人 (11.7%); 36~40 岁: 150 人 (16.3%); 41~45 岁: 114 人 (12.4%); 45 岁以上: 130 人 (14.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4 人 (10.2%); 初中: 643 人 (69.7%); 高中 (中专/职高): 167 人 (18.1%); 大专: 15 人 (1.6%); 本科: 3 人 (0.3%); 硕士及以上: 0 人 (0)
婚姻状况	未婚: 233 人 (25.3%); 已婚: 667 人 (72.2%); 不回答: 5 人 (0.5%); 缺失值: 17 人 (1.8%)
在外打工年数	不满 1 年: 104 人 (11.3%); 1~3 年: 414 人 (44.9%); 3~5 年: 257 人 (27.9%); 5~10 年: 101 人 (11.0%); 10 年以上: 46 人 (5.0%)
家庭成员流动情况	自己一个人: 573 人 (62.1%); 与父母兄弟姐妹一起: 137 人 (14.9%); 与配偶一起: 143 人 (15.5%); 与子女一起: 16 人 (1.7%); 与配偶和子女一起: 52 人 (5.6%); 缺失值: 1 人 (0.1%)

(三) 变量的描述性研究

本文研究主题涉及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 量		频 数 (%)	
因变量	参加组织情况	没有参加组织: 512 人 (55.5%), 参加组织: 410 人 (44.5%)	
自变量	经济层面适应	职业 ¹	中下层: 750 人 (81.3%); 中中层: 146 人 (15.8%); 中上层: 26 人 (2.8%)
		月收入	1 000 元以下: 237 人 (25.7%); 1 001~2 000 元: 627 人 (68.0%); 2 000 元以上: 58 人 (6.3%)
		工资水平保障生活情况	完全可以: 321 人 (34.8%); 勉强可以, 有时非常紧张: 574 人 (62.3%); 不可以: 27 人 (2.9%)
		签劳动合同	未签劳动合同: 449 人 (48.7%); 签订劳动合同: 473 人 (51.3%)
		加班费	不给加班费: 343 人 (37.2%); 给加班费: 579 人 (62.8%)
		缴纳保险	没有缴纳保险: 327 人 (35.5%); 已缴纳保险: 595 人 (64.5%)
	社会层面适应	社会地位 ²	1: 81 人 (8.8%); 2: 56 人 (6.1%); 3: 208 人 (22.6%); 4: 163 人 (17.7%); 5: 165 人 (17.9%); 6: 92 人 (10.0%); 7: 56 人 (6.1%); 8: 57 人 (6.2%); 9: 24 人 (2.6%); 10: 20 人 (2.2%)
		与打工地居民交往	从来没有: 137 人 (14.8%); 偶尔交往: 519 人 (56.3%); 经常打交道: 266 人 (28.9%)
		与打工人口交往	从来没有: 114 人 (12.4%); 偶尔交往: 404 人 (43.8%); 经常打交道: 404 人 (43.8%)
		受同等对待	没有: 246 人 (26.7%); 一般: 425 人 (46.1%); 有: 251 人 (27.2%)
		工作小时	不超过 8 小时: 84 人 (9.1%); 超过 8 小时: 838 人 (90.9%)
		休假情况	没有休假: 552 人 (59.8%); 有休假: 370 人 (40.2%)

变 量		频 数 (%)
自变量	心理层面适应	
	认同自己是	农村人: 614 人 (66.6%); 半个城里人: 268 人 (29.1%); 城里人: 40 人 (4.3%)
	打工地家的感觉	没有: 233 人 (25.3%); 一般: 410 人 (44.5%); 有: 279 人 (30.2%)
	对打工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赞同程度	不赞同: 33 人 (3.6%); 一般: 508 人 (55.1%); 赞同: 381 人 (41.3%)

注: 1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对我国社会阶层变化做了总体分析, 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 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 并把这十大阶层划分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五个等级。社会上层包括: 最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及最高等级的学者专家; 中上层包括: 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 中中层包括: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 中下层包括: 个体体力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 底层包括: 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课题组以此为依据并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把农民工的职业归入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三个等级, 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农民工的职业之间形成了等级的差别。

2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是用一个程度量表来表示的, 1 表示社会地位最低, 10 表示社会地位最高, 依次递增。

五、模型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 我们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使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中, 我们建立了三个模型, 逐一加入控制变量。从 Nagelkerke R^2 的变化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 (见表 3) 可以看出, 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情况, 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 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情况的解释能力最弱。

表 3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影响因素 (括号内为参照组)		发生比率 (Exp (B))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经济层面适应	职业: 中中层	2.360 ***	2.437 ***	2.117 ***
	(中下层) 中上层	4.991 ***	2.963 **	2.552 *
	月收入: 1 001 ~ 2 000 元	0.861	0.826	0.825
	(1 000 元以下) 2 000 元以上	0.774	0.680	0.718
	保障生活: 勉强可以	1.144	1.054	1.167
	(不可以) 完全可以	1.203	0.911	1.007
	已签订劳动合同 (没有)	1.789 ***	1.802 ***	1.790 ***
	有加班费 (没有)	1.765 ***	1.388 *	1.328
	已经缴纳保险 (没有)	2.729 ***	2.278 ***	2.167 ***
社会层面适应	社会地位		1.174 ***	1.149 ***
	与打工地居民交往: 偶尔		1.156	1.239
	(不交往) 经常		1.391	1.441
	与打工人口交往: 偶尔		0.825	0.817
	(不交往) 经常		1.274	1.247
	受到同等对待: 一般		1.225	1.143

影响因素 (括号内为参照组)		发生比率 (Exp (B))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层面适应	(没有) 有		2 953 ***	2 220 ***
	工作小时 (8 小时以上)		1 392	1 333
	有正常休假 (没有)		1 445 **	1 388 *
心理层面适应	认同自己是: 半个城里人			0 949
	(农村人) 城里人			2 307 **
	家的感觉: 一般			1 634 **
	(没有) 有			2 221 ***
	对打工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赞同程度: 一般			0 603
	(不赞同) 赞同			0 678
常数		0 167 ***	0 059 ***	0 068 ***
Nagelkerke R ²		0 220	0 312	0 330
- 2 Log likelihood		1 101. 204	1 022 058	1 005 500
卡方值		165. 652 ***	244 798 ***	261 356 ***

注: *P<0.10 **P<0.05 ***P<0.01.

在模型 1 中, 只有农民工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进入了模型, 整个模型的 Nagelkerke R² 为 0.220, 这说明经济层面适应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 22.0%。卡方检验显著, 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 职业、签订劳动合同、加班费、缴纳保险这四个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作用都是正向的, 假设 1 得到证实。

(1) 职业处于中中层和中上层这两个因素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存在正向的影响。与职业处于中下层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职业处于中中层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职业处于中下层的农民工参加组织可能性的 2.360 倍, 职业处于中上层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职业处于中下层的农民工参加组织可能性的 4.991 倍。可见, 职业层次越高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

(2) 已签劳动合同、有加班费、已经缴纳保险这三个因素都是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都存在正向的影响。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已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1.789 倍; 与没有加班费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有加班费的农民工参加组

织的可能性是其 1.765 倍; 与没有缴纳保险费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已缴纳保险费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2.729 倍。这三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都相一致。我们认为, 签订劳动合同、加班费、缴纳保险这三个指标反映出农民工劳动权益情况, 当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时, 农民工更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中去。

在模型 2 中加入了农民工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 使得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 (Nagelkerke R² 由 0.220 变为 0.312)。整个模型的 Nagelkerke R² 为 0.312, 说明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 31.2%。卡方检验显著, 社会地位、受到同等对待、正常休假这几个因素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同时我们也看到, 除了偶尔与打工人口交往这个因素的作用是负向的之外, 其他所有社会层面适应变量的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 因此证实了假设 2。

(1) 社会地位这个变量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正向的影响。可见, 社会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越大。我们认为: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越高, 其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也会越多, 从而使其越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

中去。

(2) 受到同等对待这个因素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正向的影响。与没有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2.953 倍。受到一般同等对待这个因素虽然不显著, 但其作用方向也是正向的, 其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没有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参加可能性的 1.225 倍。可见, 越是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组织。

(3) 正常休假这个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正向的影响。与没有正常休假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有正常休假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1.445 倍。我们认为: 农民工正常休假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农民工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多少, 这会影响农民工参加组织的情况。

在模型 3 中加入了农民工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 结果显示, 这个变量的加入使得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提高很少 (Nagelkerke R^2 由 0.312 变为 0.330)。整个模型的 Nagelkerke R^2 为 0.330, 说明经济、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 33.0%。卡方检验显著, 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 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家的感觉一般、有家的感觉这三个因素的作用都是正向的, 证实了假设 3。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虽然整个模型的卡方检验显著, 但是心理层面适应变量的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 (在 0.05 水平上显著)。

(1) 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这个因素是在 0.05 水平上显著, 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正向的影响。与认同自己是农村人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2.307 倍。可见, 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会影响其参加组织的情况。

(2) 家的感觉一般这个因素是在 0.05 水平上显著, 有家的感觉这个因素是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家的感觉这个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正向的影响。与没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家的感觉一般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1.634 倍; 与没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比较而言, 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是其 2.221 倍。可见, 对打工地越是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中去。

六、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经济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层次越高的农民工, 其组织化程度也越高; 当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时, 农民工更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中去。

第二, 社会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地位越高的农民工, 其组织化程度也越高; 越是受到同等对待的农民工, 就越有可能参加到组织当中去; 有正常休假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要大于没有正常休假的农民工。

第三, 心理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并不明显。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可能性要大于认同自己是农村人的农民工; 对打工地越是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 其组织化程度也越高。

当前农民工的城市化、市民化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但要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市民化, 必须要有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我们认为: 组织化就是一条实现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的切实有效的路径。有了组织这个载体, 不仅能够对农民工起到管理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公益活动的保护, 不仅是被动的, 而且可能形成进一步弱化其自身能力的“路径依赖”。流动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 之所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尚未形成一个体现其自身利益、自治性的与政府及公共部门进行沟通的社团组织。因此, 在农民工中加强组织建设, 从农民工自身发现和挖掘他们的能力和潜力, 可能是改变目前被动现状的较为有效的途径。^[14]可见,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当然,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以提升农民工的职业层次和社会地位; 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及时予以“矫正”; 同时, 政府还应对农民工

“一视同仁”，让他们在打工地有家的感觉，增强对打工地的认同感。其次，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纳入企业长期规划；积极鼓励农民工参与企业的管理活动，提升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提高他们在企业的社会地位；同时对农民

工要与其他企业员工一样同等对待，使他们在企业有家的感觉。最后，农民工组织要加大作用力度，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以增强组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要经常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丰富农民工的娱乐休闲生活，加强人文关怀，增强农民工对打工地社会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13] 卢国显:《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治安对策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2] 钱正武:《农民工的阶级属性及其向工人阶级的转化》,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1)。
- [3] [14] 宋玉军:《推动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政治经济学思考》,载《技术经济》,2006(6)。
- [4] 吴亚平:《对农民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实现形式的探讨》,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1)。
- [5]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载《江海学刊》,2002(6)。
- [6]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7] 石刚、李景平、赵恒:《农民工城市浅层适应性状况研究》,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4)。
- [8] 陈成文、彭国胜:《社会学视野中的农民工组织化》,载《理论月刊》,2006(11)。
- [9] 王光甫:《自组织理论与建筑业农民工的组织化》,载《法制与社会》,2008(1)。
- [10] 徐旭初、吕冬洁:《农民工维权组织及组织化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 [11] 刘小年:《农民工的组织状况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5)。
- [12] 周明宝、张波、唐霞:《“工荒”背景下的青年民工组织化与劳资关系整顿》,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

The Impact of Social Inclusion to the Systematism of Peasant Workers

CHEN Xu-feng, TIAN Zhi-feng, QIAN Min-hu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peasant workers are in the condition of “no organization”, many organizations tend to keep peasant workers out. Overall speaking, the condi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is pessimistic, certainly there is obvious internal diversity about the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difference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adaptation at every level to peas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variable of economic adapta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of peas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 the best, followed by variable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variable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the worst.

Key words: peasant workers; condition of social inclusion; systematism

(责任编辑 武京闽)